

数字媒介使用与青年船民职业选择关系研究： 从以船为生到以船为业

冷南羲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职场经验的口传心授逐步被标准化、数字化流程取代,数字媒介使用成为影响青年职业选择的重要变量,二者关系有待进一步明晰。从事运河航行的个体户(简称船民)是当前运河职场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其职业选择既因为数字媒介使用而改变,又延续着重资产运营、以船为家等特征。基于对 44 位船民的调查,采用比较研究视角和媒介理论分析框架,旨在明晰数字媒介使用对其职业选择的影响,船民对数字媒介的接受,探寻二者递归优化的可能。研究发现,在历时性维度,不同于老一辈船民以船为生的坚定职业选择,和被有限媒介形式单向支配的生产生活状态,青年船民的职业选择体现出以船为业的被迫性、暂时性和多变性,受到数字媒介使用的主导性影响;从共时性维度看,数字媒介使用对于青年船民职业选择的影响具有两面性,针对其远虑近忧并存的职场状态,需要形成以结构化认知为前提、自适应调节为核心、间接性引导为补充的递归优化体系。

关键词:数字媒介使用;职业选择;青年船民;运河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6)04-0089-12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KYCX24_0089);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23SJZD147)

一、问题的提出

工作对个体的意义无需赘言,青年群体的就业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进入 21 世纪后,数字媒介所体现出来的社会行动力让人感受到媒介的力量,感受到媒介对人存在方式的建构,感受到人只有通过媒介才能通达这个世界^{[1]20},职场经验的传承方式也由口传心授向标准化、数字化流程转变,青年职业选择与数字媒介使用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明晰。

2014 年中国大运河的成功申遗使得运河研究成为热点,经过十年沉淀,多元对象逐步进入研究者视野,船民^①正是其中之一。从历时性维度看,运河的物质连接与精神联结都依赖船民完成,船民也以河为生、聚水而居、代代相承,二者形成长期稳定的关系;从共时性维度看,受到数字技术普及、规范化治理等因素影响,当前船民主要由 85 后构成,老一辈船民迅速退场,航运业生态发生显著变化。相较于他们的父辈,青年船民在择业、从业和转行时更多依靠数字媒介提供的信息进行决策,而非前辈经验的口耳相传,呈现出由以船为生向以船为业的职业特征转变,既带有信息来源多元化、信息量过载等数字媒介使用的共性特征,也面临子承父业传统压力、转行代价高昂等个性挑战。因此,

^①本文提及的船民主要指以运河为生的个体户、私营货运船只,其历史极为悠久,可以追溯到唐代,正如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言:“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漕运,私行商旅,舳舻相继。”虽历经王朝更替、千年演变,但船民群体始终占据运河交通运输的基础性地位,是与运河关系最密切、数量最多的水上群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研究将聚焦这一变化,采用对比研究的方式分析青年船民职业选择与数字媒介使用的关系。

(一) 研究回顾

1. 数字媒介使用

数字媒介使用包括数字媒介和媒介使用两个部分:前者是以互联网基础设施为前提的新型媒介形态,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系统化的互文性产品^[2];后者涉及工作中,人们借助媒介管理信息、和同事交流、获取知识;生活中,通过线上聊天、分享照片等媒介使用行为^[3]。当前,全球数字媒体生态正在加速基础设施化,媒介系统逐渐成为不同社会生活范畴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与制度配置^[4],数字媒介使用由此成为与个体生活如影随形的幽灵:有学者认为在数字媒介使用过程中,看似单纯的文本接受行为,本质上却是一种融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于一体的具身操演^[5];也有研究聚焦在地实践,探索农村学前儿童数字媒介使用行为、家长干预方式与儿童社会情感发展的关系^[6]。数字媒介使用是影响船民职业状态的主要新进变量,智能手机、社交软件等通用型数字媒介,以及自动识别系统(AIS)、船民之家等专业型数字媒介的(强制)普及,重塑了我国运河航运业生态,但关于数字媒介使用与船民职业状态关系的研究仍是空白。

2. 青年船民职业选择

青年船民不同于船员^①、海员^②、帮工^③和学徒^④,具有船员专业性和民众生活性的双重身份。和其他群体的职业选择相比,青年船民的职业选择既面临选择多样化、注重经济效益等共性特征,也面临地理环境依赖、以船为家等个性特征。有关青年职业选择的研究是近年来的学界热点,覆盖价值认同、个体发展等维度,有学者注意到青年职业选择与数字媒介使用的关系,提出构建返乡青年县域城市融入的媒介支持系统^[7],智能媒介技术推动青年职业衍生与青年文化延展^[8]等观点,但关于青年船民职业选择的研究几近空白。与普通青年相比,青年船民的职业选择同样包括择业、从业和转行阶段,需要借助外部经验辅助阶段性决策,职业态度与经验随着成长而变化;但青年船民承担的转行压力更沉重^⑤,面临更强烈的文化和生活不适应感。与老一辈船民相比,青年船民的文化和认知水平更高,熟悉并依赖各类数字媒介的使用,影响他们职业选择的诱惑也更多。

(二) 研究方法 with 案例编码

1. 研究方法:跟船

本研究主要采取质性研究方法,在跟船过程中通过深度访谈、焦点小组座谈和参与式观察获取经验材料。由于船民具有以船为家^⑥的特征,只有采用跟船的方式才能接近和长时间聚焦该群体。先在码头、船闸等船只停靠区与船民建立信任关系,寻求登船机会,之后上船与船民同吃、同住、同行,抵近观察其生产生活状态。笔者于2023年2月至2024年12月间分别对浙江省C港,江苏省S船闸和安徽省L县等7个地点的12艘船、44位船民展开调研,覆盖船民生产生活的全时空^⑦,每次持续3~7天,共进行12次。

共有14位船民接受了半结构式访谈,其中11名85后^⑧船民使用智能手机时间超过6小时/每天,10人为私营船主,1人为航运公司雇员。受访者信息,见表1。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在2小时以上,知情并认同访谈目的和文本处理方式,围绕入行原因——从业感受——转行规划的主轴展开访谈,并聚焦数字媒介使用在不同阶段的影响提问。为确保研究对象的隐私和文本来源呈现的直观性,统一按姓名首字母编号。访谈通过日常聊天切入,将结构性问题打散在对话中,以期获得直接反

①一般为企业雇佣的专职人员、全职员工。

②业内称为“高级船员”,能够执行远洋航运和内河航运任务。

③无从业资格证,但有经验,在船上帮忙,多为无法取得船员证的老一辈船民。

④无从业资格证和经验,在船上学习。

⑤笔者调研的船只多为2000吨级,造价在300万元人民币左右,船民基本都是贷款购买;船民职业技能单一、通用性差。

⑥生产生活时空的一体化,跟着货源实时移动,非必要情况不上岸。

⑦白天和夜间时段、运动和静止状态、水面作业和上岸办事场景等。

⑧另外3名船民为60后,因为方言、受教育水平等原因无法全程参与半结构式访谈。

馈;在面对被访者回答出现持续回避或跑题情况时,采取重复提问和亮明目的两种方式进行纠偏。在获取阶段性访谈文本后,立即对其进行开放式编码,并针对开放式编码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提高询问权重,作为下一次访谈的重点。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年龄	性别	学历	数字媒介使用经验	职业轨迹
SDP	33	男	高中	小学接触电脑,初中拥有手机,游戏爱好者	高中毕业后因追求 ZYL 前往上海求职,当过餐厅服务员、酒吧保安
ZYL	32	女	初中	初中拥有手机,淘宝重度爱好者,曾尝试直播带货	初中毕业后前往上海求职,在某品牌面包店历任收银员和销售员,与 SDP 结婚后上船
SCB	24	男	高中	小学接触电脑,初中拥有手机	高中毕业后从军,复员后在表哥 SDP 和父亲 SWG 的劝说下返乡跑船
SWG	58	男	小学	使用老人机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上船帮忙,现在给刚跑船的儿子 SCB 当副手
SWJ	60	男	小学	使用老人机,刚学会在平板上使用微信,方便孙子与儿子视频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上船帮忙,现在闲时在家带孙子,忙时上船给儿子 SDP 当副手
PGP	62	男	小学	使用老人机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上船帮忙,现在在航运公司当副手,后代均在岸上谋生。
ZCY	38	男	初中	工作后拥有手机,受到老婆 LJ 影响,希望通过直播开辟副业	初中毕业后招工到合肥工厂,父亲患病后接手家里的船只,2020 年转行上岸开餐馆,半年后因经营不善倒闭,被迫贷款重新跑船。
LJ	36	女	初中	热衷成为美妆博主,闲暇时常给同行的姐妹做美甲	初中毕业后进纺纱厂工作,2010 年与 ZCY 结婚后上船。
HZY	30	男	职高	小学接触电脑,初中拥有手机,与 SDP 在游戏上认识并成为朋友,常相约跑同一航线	职高毕业后经过父亲引荐进入某码头公司从事装卸工作,半年后觉得跑船收益更高,接手家里的船只。
FQ	29	女	初中	初中拥有手机,与 HZY 在网上认识,后结为夫妻	初中毕业后在自家理发店帮忙,2017 年与 HZY 结婚后上船
WB	28	男	初中	到广东打工时拥有手机,因贩票业务接触到电脑	初中毕业后到广东打工,之后贩卖车票,实名制购票普及后返乡跑船
JXK	27	女	初中	曾报名电脑培训班学习打字,具备一定的电脑知识	与 WB 是同乡,曾一起在广东打拼,之后成婚,返乡跑船
HWR	18	男	高中	小学拥有手机,游戏高手,曾梦想成为职业选手	高中毕业后从事房屋销售,最近在堂哥 WB 的船上当学徒
ZY	37	男	职高	毕业实习时拥有手机,因是企业雇员,熟悉各种办公软件	职高毕业后从事旅游大巴驾驶员,新冠疫情后自学考取船员证,入职航运公司

备注:SDP 作为体育特长生参加高考,但填报志愿时遭遇掉档,虽然获得某大学通知书,但放弃入学资格。

2. 经验材料编码

跟船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材料较为庞杂,需要通过系统编码让理论概念浮现,从而聚焦数字媒介使用与青年船民职业选择关系研究。为统合经验材料分析的严谨性与获取的灵活性,笔者采取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分析取向,同时遵循程序化扎根理论的操作路径,对经验材料进行开放性、主轴性与

选择性三个层级的编码。

首先进行开放性编码,经验材料一方面来自跟船过程中的现场笔记和备忘录,另一方面来自半结构化访谈时船民的回答内容。根据抽象程度差异,将开放性编码分为标签化和概念化两个层级,共获得标签性编码168个、概念性编码32个,并归纳为近忧与远虑、择业/从业/转行阶段等7个类别。其次进行主轴性编码,结合经验材料和研究问题展开,聚焦数字媒介使用与青年船民职业选择关系研究,按照“对后文阐释性价值”的标准进行标注,共获得代际传递鸿沟、数字媒介使用能力差异等6个类别。最后进行选择性编码,在同其他类别的比较中展开,聚焦潜在的核心概念和关键变量,共获得媒介素养、数字媒介他律与熟人社会自律、内部优化与外部支持3个类别。形成表2后,通过公开和单独展示、焦点小组座谈等方式检验,船民未提出新的变量。

表2 数字媒介使用与青年船民职业选择关系

开放性编码标签化	开放性编码概念化	主轴性编码	选择项编码
老一辈船民不使用、不信赖数字媒介,因此无法取得船员证,被迫失业 青年船民从小接触数字媒介,快速考取船员证	年龄差异	代际传递鸿沟	媒介素养
受访女性因为与男性船民结婚而上船,选择从事航运业受数字媒介使用影响较小 受访男性多为船民家庭后代,选择从事航运业受数字媒介使用影响较大	性别差异	数字媒介使用能力差异	
数字媒介使用的积极影响:交易便捷、娱乐方式多样 数字媒介使用的消极影响:竞争加剧、担心后代沉迷网络	积极与消极影响	职业选择阶段性差异 数字媒介使用评价	数字媒介他律与熟人社会自律
数字媒介使用带来的近忧:运价一再走低、平台垄断信息赚取差价 数字媒介使用导致的远虑:老旧船舶报废补贴、后代工作问题	近忧与远虑		
数字媒介使用对生产的影响:行业准入门槛、市场化交易取代熟人交易 数字媒介使用对生活的影响:物资采购渠道、与家人联系方式	生产与生活		
数字媒介使用对择业阶段的影响:提供职场信息、提供从业者反馈 数字媒介使用对从业阶段的影响:积极/消极、远虑/近忧 数字媒介使用对转行阶段的影响:预测本行业发展前景、提供其他职场信息	择业/从业/转行阶段		
行业规范(船民视角):抵制恶意报价、严惩运费拖欠行为 改善生活(船民视角):临时停靠区增加洗浴设施、快递柜,关照留守儿童 政府视角:确保航运安全、减少管理负担	改善诉求	应对策略选择 核心关切错位	内部优化与外部支持

备注:大部分女性船民并非船民家庭出生,因为嫁给船民,所以上船谋生。

二、以船为生:老一辈船民坚定的职业理想

数字媒介的普及重塑了运河航运业,也改变了船民的生产生活。但船民职业选择的变化、数字媒介的影响以及二者的关系仍处于长期演变的过程中,甚至产生新的矛盾。本研究首先聚焦老一辈船民的职业生涯,通过历时性维度的对比研究,分析前数字时代船民职业选择与媒介使用间的关系,为理解共时性维度青年船民职业选择与数字媒介使用的关系奠定基础。

(一) 靠水吃水:天然媒介的许诺

三位老一辈船民的人生经历大致相同:故乡人多地少,需要另谋生路;家乡靠近运河,航运业成为首选工作;先跟着父辈跑船学习,分家后独立驾驶;妻子是同县人,婚后成为船上的二把手,孩子留在故乡由父母照看;2018年左右彻底^①失去合法从业资格,但仍心系水上。谈论起跑船的事,他们兴致高昂,表现出极高的职业忠诚度、较强的职业归属感与荣誉感,以及丧失合法从业资格的遗憾:“靠跑船给两个孩子在城里买了房,可惜他们不愿接手家里的船,其实比在岸上挣得多,我在岸上待不惯,又回来打下手。”(PGP)

紧邻运河是以船为生的前提,也让靠水吃水的理念深入人心,作为媒介的运河给予人们以船为生的许诺,并通过历史图景与家族经验加以固化:一方面,迟至宋代,以船为生的船夫已是一个数十万之众的社会群体^[9],PGP表示本村早在清朝时就集体跑船,自己在水边长大,少年上船帮忙,之后在船上娶妻生子,身边的人也大多如此,循环往复。另一方面,以船为生的先行者往往获得可观收入,受到家族和同乡的持续关注。例如SWG和SWJ是村里第二代船民,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普遍窘境也长期困扰着这个村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兴修的茨淮新河才使其父辈看到了发家致富的希望,而长辈们的成功又吸引了后辈的目光,跑船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改变人生的方式。

可见,船民将运河视为天然媒介,关注其带来的靠水吃水的许诺,即运河形成后具备的交通运输功能,难以把握该媒介的全貌,无法看到不同层级关于运河的博弈,开凿和维护河道付出的代价,承担风险的能力有限^②,在面对航运业生态变化时存在被清退的可能。靠水吃水的机会因为船少人多的缘故还需竞争上岗,加之在老一辈船民的择业阶段,我国社会的传播媒介单一、信息流动迟滞、经济水平落后,致使人们职业选择空间极为有限,强化了可见的航运工作的诱惑。

(二) 竞争上岗:单一媒介的诱惑

三位老一辈船民出生于1960年初,能够接触到的现代媒介屈指可数,信息渠道极为有限,加之家庭贫困未上过学,在其成长和初次择业时基本依赖父辈经验的口耳相传,认为跑船是最好的职业选择。SWG回忆,二叔是村里最早跑船的,总能带回各地物产,每次靠岸都受到村民的簇拥,更易获得女孩的青睐。与此同时,60后多有兄弟姐妹,家中男性后代^③需要通过竞争获得上船帮忙的资格,从而具备继承船只的可能。SWJ回忆,男孩身高过了锄头就上船帮忙,表现最好的才能留下,除了下苦力,会不会和人打交道、够不够灵活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没能在自家船上留下的青年男性或者在同乡船上找机会,或者求助父辈购置新船,全力争取以船为生的机会。

通过积极表现,三人于20世纪70年代末正式入行,之后的职业生涯大致分为跟船实习和自己做主两个时期。学习驾驶技术、掌握货源信息、处理水上关系是实习期最重要的三件事,受制于当时落后的媒介技术,船上生活几乎与世隔绝,谋生经验只能依靠父母的口传心授:“除了驾驶技术,更重要的是父母带着沿途拜码头,得和货主、买家和管事的人搞好关系。”(SWJ)经过实习的三人在20世纪80年代接过主舵,进入自己做主的阶段。时值改革开放初期,航运需求与日俱增,连接买卖双方

^①我国运河航运业大约从2010年开始要求持船员证上岗,老一辈船民因为受教育程度有限,且不适应上机考试,无法取得船员证。起初可以通过购买证件、代考等方式蒙混过关,但之后检查愈发严格(如考试刷脸),最终丧失合法从业资格。

^②不论是运河航运业内部的权力博弈(如处罚标准),还是外部新型交通媒介(如铁路运输)的出现,都对船民职场前景产生决定性影响。

^③女孩一般不上自家的船,多嫁给同辈船民。

的船民成为市场宠儿,尽管交易方式和信息渠道仍旧落后,但水涨船高的收入、积极的市场反馈和同龄人羡慕的目光,让曾经的媒介许诺变为现实、少年竞争上岗的努力充满意义:“每到码头,商家蜂拥而至,递烟递水,抢着预付货款占据仓位。每过几年就换一次船,吨位越来越大,家里生活越来越好。虽然船上条件艰苦,但挤破头才上的船,挣得又多,从没想过换工作的事”(SWG)。

可见,在老一辈船民成长和职业选择初期,因为媒介形式单一、信息渠道有限,来自父辈口耳相传的经验决定着他们的职业选择,使得跑船成为理想工作。为了获得上船的机会,少年们展开竞争,胜出的佼佼者还需要通过漫长实习以获得主驾权,而之后的丰厚回报既强化了靠水吃水的诱惑力,也坚定了他们以船为生的职业态度,自然没有转行的想法。但在最近十年,随着数字媒介在运河航运业的全面普及,难以适应的老一辈船民被迫交出主舵,迅速退出一线。

(三)被迫退场:数字媒介的阻隔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运河航运规模不断扩大^①,吸引了更多岸上群体“下水捞金”,致使航道愈发拥挤、配套设施难以满足需求,“因为船只碰撞和过闸顺序导致的斗殴时常发生,停靠休整时经常遇到盗窃,因为缺乏信息沟通方式,无法及时求救”(SWG)。这一相对混乱的局面在2010年后得到明显改善,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数字媒介基础设施在运河逐步普及:手机成为船民标配,辅助航行系统成为船只标配,智能管理系统陆续上线运行。但几乎所有老一辈船民都切身感受到数字媒介产生的巨大阻隔,拥有丰富航运经验的他们面临被清退的风险。

一方面,为实现对运河航运业的源头治理,相关部门制定并实施了从业人员准入机制。从事船上工作的人员需要通过理论和实践考试方能上岗,并定期审核船员证。但是老一辈船民普遍缺乏基础教育背景,也难以使用数字媒介,无法获得合法的从业身份,只能上船打下手。“考试要用电脑,培训要用手机,我们都不会。最初还能找人办证或者替考,现在都要刷脸,一点空子都没有了;虽然什么都会,但遇到检查,什么都不算。”(SWG)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媒介基础设施的持续渗透,重塑了社会形态和运河航运业生态,过去的面对面交易、上岸登记过闸等工作被如今的线上操作所取代,老一辈船民在观念上无法认同,在行动上难以实现。“几万块的货划划手指就结算了,万一没收到怎么办?都没见过面,怎么敢接他的货,万一赖账怎么办?”(PGP)

伊尼斯曾用知识垄断的概念阐释国家之间的关系:“文明中心的知识垄断占据支配地位,其结果必然是,边缘地区的知识垄断就受到局限”^{[10]36}。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老一辈船民在数字时代的职业处境:数字媒介成为当前社会系统的偏向,主导着知识生产和传播,难以使用数字媒介、无法适应数字环境的老一辈船民成为运河航运业的边缘人群。但对于和数字媒介同生共长的青年船民而言,则走上了与老一辈船民不同的职业道路,他们的职业选择与数字媒介使用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

三、以船为业:青年船民的阶段性职业选择

老一辈船民是曾经的青年船民,青年船民是未来的老一辈船民。青年船民的职业选择既带有原生家庭的烙印,又始终受到数字媒介的他律作用,他们所处的成长环境、面对的职业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①自幼温饱不愁,完成义务制教育,熟悉电视、电脑、手机等数字媒介。②职位选择多、职业态度多变,主要通过使用数字媒介获取职场信息。③航运业生态因数字媒介的普及发生明显变化,效率提升、竞争加剧、线上操作愈发普及。本研究通过比较青年船民与老一辈船民在职业选择上的差异,分析数字媒介使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从而理解青年船民职业选择与数字媒介使用的关系,进而为二者递归优化奠定基础。

(一)择业阶段:都市职场的诱惑

受访的青年船民多来自船民家庭,父母工作稳定、收入较高(相较于同乡务农家庭)、常年在外。

^①2022年京杭大运河货运量近8亿吨,位居世界运河货运量第一、内河水运量世界第三(第一为长江水系、第二为珠江水系)。

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青年船民的择业阶段更长,甚至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与其成长环境息息相关。“自打记事,只有春节才见得到父母,对跑船又爱又恨,既让我们吃喝不愁,也让我们远离父母。长辈时常念叨跑船的事,希望我们继承家业。”(ZCY)20世纪90年代成长和21世纪初择业的85后青年船民,熟悉使用各类常见的数字媒介,具有万物互联特质的数字媒介带给他们无限遐想:

一方面,与乡间同龄人相似,在青年船民成长过程中,电视、电脑、手机等数字媒介逐步普及,共同营造出乡村之外的世界图景,尤其是现代、发达、美好的城市意象,成为他们的向往之地。HZY回忆,风靡一时的港剧、流行音乐唱片、电视节目和上网冲浪将城市塑造为实现梦想的舞台:无数职业虚位以待、一夜暴富并非幻想、白领生活触手可及。另一方面,与乡间务农家庭的后代相比,船民后代的生活相对富裕,普遍更早地接触到数字媒介^①,同时因为长辈的絮叨和现实的落差抵触以船为生的职业取向。“父母每次离家都预留家里半年的开销,我也成为村里最早拥有MP3、手机和电脑的人。长辈常唠叨跑船的好,我在暑假上过船,热得受不了、吃不习惯、睡也睡不好、更没有玩的。”(HWR)相对富足的成长环境让船民后代无法体会到父辈年少时竞争上岗的迫切诉求,数字媒介营造的都市职场画面与艰苦枯燥的船上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可见,数字媒介使用在青年船民的择业阶段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他们获取信息、认知世界的主要渠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职业选择。数字媒介提供的职场信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乡间的所见所闻和家人苦口婆心的劝导,跑船自然不是他们首次从业时的第一选择,致使老一辈船民预想的子承父业的计划大多落空。

(二)从业阶段:职场危机与被迫下水

走出校门后,青年船民获得从业资格,迫不及待地离开乡村,前往数字媒介描绘的现代都市,寻找心心念念的岗位,但落差很快显现。与初入职场的青年相似,青年船民受困于经验缺乏、眼高手低、技能生疏等共性问题;与城市青年相比,初来乍到的他们又处于信息弱势方,亟须熟悉环境、重建人脉、获取资源,原本引以为傲的媒介优势反倒成为短板。“我在村里被称为‘包打听’,到了城里却两眼一抹黑,看不上街头招工,但好的岗位又需要内推,找不到渠道。(ZCY)”在都市职场接连受挫后,青年船民不得不面对严峻的选择:或者继续留在城市闯荡,或者返乡接手家里的货船。受访的6位^②青年船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者,并作出解释。具体见表3。

表3 青年船民返乡跑船的原因

编号	都市工作经历和持续时间	返乡原因(共性)	返乡原因(个性)
SDP	餐厅服务员(三周)、酒吧保安(三天后发现被骗)、待业(三个月)	1. 父母不会使用数字媒介,无法获得航运业从业资格,难以适应新的行业生态,迫切需要帮忙 2. 通过亲临现场,发现都市职场与数字媒介的描述相差甚远,产生巨大落差 3. 城市生活成本高,文化环境不适应,对数字媒介提供的信息产生怀疑 4. 成婚生子压力等	家里给的钱花光了
ZCY	进厂(两年)		父亲生病,家里船只空闲
HZY	装卸工(半年)		从业期间发现跑船个体户挣得更多
WB	打零工(两年)、卖票(一年)		售票实名制,无利可图
SCB	入伍(两年)、退伍休息(半年)		求职不顺,无所事事
HWR	房产销售(两个月)		房地产业不景气,拖欠工资

^①既有钱购买,又需要和船上的父母保持联系。船民出于远离家庭、疏于照顾后代的愧疚感等缘故,也尽力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

^②因为在受访的11名青年船民中,ZY是非船民家庭出生的航运公司雇员,另有4名为青年船民的妻子,也非船民家庭出生,所以只有6名男性青年船民具有继承家里货船的资格,面临继续留在城市闯荡,或者返乡接手家里货船的选择。

青年船民返乡跑船既是迫不得已的职业选择,又顺应了父母的意愿,在养活自身的同时解决了家庭的燃眉之急,其所具备的媒介素养,成为一箭双雕的底气所在。一方面,由于掌握数字媒介使用技巧,青年船民很快通过行业考试,成为船只名义上的主人。另一方面,青年船民的回归不仅迅速解决了自家船只运营的合法性难题,而且立刻接入数字航运时代,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彼时,行程申报、日志填报、客情维护等航运工作必备事项大多依赖数字媒介终端完成;面对由数字媒介主导的结构性变化,老一辈船民显得束手无策,青年船民则信手拈来,取证上船后立刻接手了船只的生产经营主导权,积极使用数字媒介获取货源信息,寻找运价高、航程适中、装卸货方便的最佳货源。

可见,都市职场受挫的青年船民需要通过跑船养活自己,运河航运业数字化转型也需要青年船民的加入。由于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青年船民能够轻松地使用常见数字媒介,既符合现代航运业的准入标准,又适应数字化的水上生活,迅速成为航运业主力。但逐渐在水上站稳脚跟的青年船民并不安分,转行上岸的想法挥之不去,跑船被视为积累上岸资本的阶段性过程,是暂时的职业而非长远的生活,并通过使用数字媒介,寻觅转行时机。

(三) 转行阶段:既有远虑,又有近忧

成为船老大后,青年船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结婚生子,婚后妻子成为船上二把手,老一辈船民回到岸上照顾孙辈,家庭结构完成转型。受访的已婚青年船民大多成婚于2010—2015年期间,新成立的家庭抓住了行业红利^①的尾巴:2021年前我国房地产业还处于上升阶段,其开发投资额、商品房销售额都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11]。与此同时,运河航运业基本完成规范化治理和现代化转型,从业环境得以优化。

在生产方面,青年船民按照政府部门的要求下载各类App,通过远程在线即时管理,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货运业讲求按时送达,从前行程耗时难以预估,很多单子不敢接;现在可以在手机上提前申报行程,查询气象信息、河道拥堵程度和过闸顺序,从而预估行程用时,降低了违约风险。”(WB)商业航运App成为青年船民获取货源的重要渠道:货主和船民分别将货源信息和船只信息上传,双方通过数字媒介平台寻找交易机会。此外,青年船民还自发组建微信、QQ等社群,分享潜在货源、船舶交易、违章处理等信息;数字货币、搜索引擎等通用型数字媒介的普及也极大提升了运河航运业的工作效率。在生活方面,无线网络成为每艘船只的标配,视频聊天缓解了青年船民对孩子的思念,网络游戏、有声书、短视频等娱乐形式填补了无聊时光,外卖、线上购物、网约车等服务成为新的补给渠道。数字媒介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推动社会的深度媒介化进程,人们对媒介的功能性依赖与精神性依赖都变得更加突出^[12]——青年船民使用数字媒介的频率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但历史问题并未因数字媒介的使用而根除,新的问题又因数字媒介的使用而滋生,加剧了既有远虑又有近忧的青年船民的转行诉求。

媒介影响的两面性一直备受关注,早在20世纪初,本雅明就提出机械复制的普及既导致艺术作品灵韵凋谢,又首次把艺术作品从对仪式的寄生性依赖中解放出来^{[13]240},使用数字媒介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于青年船民而言,后代的教育问题是他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和远虑。SDP是受访者中学历最高的,但因为无人指导志愿填报而掉档,最终无学可上,所以格外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父母没有文化,只能管生活,等孩子再大点老婆就上岸陪读,县城的学区房早买好了。”妻子ZYL则更重视陪伴:“虽然能视频,但比不上在身边陪伴。老师虽然明面上不说,但还是更关照父母在身边的孩子,容易出成绩。”此类远虑是历代船民共同面对的历史难题,过去因忙于解决温饱而无暇顾及,如今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成为青年船民的后顾之忧,是促使其转行的间接因素。

相较于后代教育的远虑,因数字媒介使用导致的行业竞争加剧和信息垄断问题则成为青年船民迫在眉睫的近忧,成为促使其转行的直接因素。首先,作为运河航运业支柱的房地产业在2021年后

^①房地产业的旺盛需求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运河航运业持续繁荣的主要因素,大量建材有待运输。

开始萎缩,导致货运总量下降、运输周期变长、低价中标常见;加之油价、生活开支等成本上涨,进一步影响了船民的生活质量和对行业的预期,焦虑情绪通过社交媒体持续蔓延并发酵。其次,近年来部分失业人群涌入运河航运业,加剧了船多货少的局面。最后,不论是青年船民自发组建的微信、QQ群,还是第三方商业航运App,都不同程度出现信息垄断现象,HZY分享的河南小麦事件正是典型代表:“商业航运平台获悉河南小麦急需运输的消息后,发布远超市场均价的订单,吸引船民前往,但限制出货量;该地区很快聚集了大量空船,平台遂压价并恢复正常出货量,船民只能妥协,以收回成本。”

可见,青年船民凭借熟练使用数字媒介的优势迅速成为行业主力,但同时面临远虑和近忧,并试图通过使用数字媒介寻觅转行良机。“疫情那会儿外贸滞销,群里的老板急着出货,提供内销渠道、出售厂子和店铺,我堂兄下手快,卖掉船上岸了。”(WB)但此时的青年船民比初次择业时更有经验,身上的责任也更重,面对数字媒介提供的信息有着自己的综合判断:“不管做什么,养活全家是前提。还要考虑船只出手的时机,这是家庭的固定资产,一旦变现,再想跑船就更难了。”(SDP)基于对数字媒介使用与青年船民职业选择的关系分析,需要进一步探寻二者的递归优化方式,并缓解青年船民在当前职场中普遍面临的远虑和近忧压力。

四、结论与讨论:数字媒介时代青年船民职业选择的递归优化

从老一辈船民以船为生到青年船民以船为业的职业特征改变,是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数字媒介则是其中的主导性力量 and 与个体的终端交互界面:既凭借与众不同的建构方式,使得物质实在与非物质实在之间的界限产生根本性改变^{[14]65},又是在界面的统合之下,媒介才能贯通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15]。运河航运业与其他社会领域一样,被裹挟进入这场数字洪流。因此,青年船民面临的职业选择难题既是社会深度媒介化进程中的共性问题,又带有运河航运业的个性特征,需要在变(媒介形式和行业生态)与不变(生活保障和行业竞争)的纠葛中探寻潜在的递归优化可能。

(一)结构化认知:整体、历史、动态的观察视角

认知是行动的前提,结构化是指任何社会结构和制度均需要通过结构化的过程在社会和组织中得以实践和运转,人的行为不仅受结构的制约也重塑结构,结构和行动相互依存,形成一个持续动态演化的实践系统^[16]。在本研究中,结构化认知体现为整体看待当下青年船民职业选择的远虑和近忧,历史把握船民群体职业选择的演变,动态跟踪青年船民职业选择的趋势。

一方面,相较于老一辈船民以船为生的单一想法,青年船民的职业选择始终矛盾:择业阶段陷入都市市场诱惑和继承家业的矛盾,从业阶段陷入坚守岗位和返乡跑船的矛盾,转行阶段陷入既有远虑又有近忧的矛盾。职业选择的矛盾自古有之,在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后显得愈发突出,同时受到数字媒介使用的催化作用:媒介的人性化发展不断满足了人的个性化需求、增强了沉浸体验,但也可能弱化人的主体性意识,导致人的异化,使人过度依赖媒介^[17]。另一方面,青年船民的职业选择相较于其他职业显得更为复杂。“下水容易、上岸难。且不说转行上岸拿什么养家,船只如何出手、何时出手、在哪出手都有讲究,上下几十万的浮动,是几代人的心血。”(HZY)船民重资产运营、单一生存技能等职业特征延续到数字时代,并非使用数字媒介就能迎刃而解。

青年船民的职业选择在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变得极具挑战,甚至演变为社会性难题。如果不能整体、历史、动态地看待职业选择与数字媒介使用的复杂关系,可能导致认知层面的一叶障目、实践层面的盲目冲动,或者如父辈般被迫退场,或者重蹈自身择业阶段草草收场的覆辙。作为家庭支柱的青年船民如何在媒介实践中保持独立且深度地思考在当下看来并非易事,存在虚拟互动可能导致现实社交能力弱化、信息茧房效应加剧认知焦虑等挑战^[18]。

(二) 自适应调节:意见领袖、旁人经验与有限尝试

尽管媒介素养的提升任重道远,但并不影响青年船民持续使用数字媒介,甚至在此过程中形成自适应调节,有利于数字媒介使用与青年船民职业选择的递归优化:一方面,作为半独立机构的媒介具有规则以及资源配置的特点^{[19]25},能够进行自我调节;另一方面,结合笔者的田野观察,当前青年船民在使用数字媒介的过程中,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主动适应并调节职业发展方向。

其一,青年船民通过抖音、快手、微信等数字媒介平台自发地分享从业感受,由于此类分享关系到船民整体生存状况,经常直击痛点问题,带有明显的船民立场,往往获得较高的关注度,言之有理者甚至被推举为船民群体的意见领袖。受访的11位青年船民都是抖音爱好者,多次向笔者推荐某抖音号:该用户也是子承父业的船民,其视频内容主要为解读航运政策、分析行业现状、提供交易信息,截至2024年6月,已拥有2.4万粉丝、收获51.6万点赞、带货591件,目前从业于某船舶服务有限公司。以抖音平台为例,直接以跑船作为名称的用户数以百计,其中甚至有百万级粉丝量的用户,他们的日常分享不仅影响着同行的职业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运河航运业现状,具有进一步改善青年船民生存状况、缓解职业选择焦虑的可能。

其二,自古以来,运河航运业始终存在入场门槛和水上规矩,拉帮结派、抱团取暖、互通有无是船民群体的生存之道,彼此联系较为紧密,团队成员的职业选择更具说服力,并通过数字媒介广为传播,成为青年船民使用数字媒介时优先和重点关注的信息。在受访的全部14位船民中,有12位彼此相识,并受到ZCY夫妇转行上岸经历的影响:“2020年年中,我们出售了船只,返回县城开餐馆。但做了半年,反倒亏了几十万,又贷款购船、重新下水。”对于其他青年船民而言,由于和ZCY夫妇彼此相识,且生活境遇(年龄、技能、本金、家庭结构、信息渠道等)和职业历程相似,先行者转行上岸的经历比意见领袖的陈述更可信,失败的教训也给跃跃欲试的他们泼了凉水。“我们是看着ZCY上岸又下水的,最后反倒赔钱了,几年白干。他都做不成,我们估计也差不多,更不敢轻举妄动。”(SDP)

其三,由于上岸转行代价较大、风险难测,青年船民对此十分谨慎,但在跑船的同时也积极开拓副业,既是休闲娱乐,又能增加收入,还能寻找转行契机。此类副业具有三方面的特征:首先,投入较小;其次,与船民日常生活和兴趣相关,例如男性喜爱的钓鱼、游戏,女性喜爱的短视频、美妆成为最常见的素材内容;最后,极度依赖现有数字媒介基础设施,涉及内容生产、分发、反馈和变现的全流程。ZYL跑船前在上海某蛋糕店工作,具有一定的销售经验,曾尝试在船上直播带货外贸滞销的服装;HWR是手游高手,闲暇时间或者用大号直播,或者用小号代打。尽管副业收入有限,鲜有转为全职工作的案例,但足以成为青年船民喜闻乐见的有限尝试。“近年来钓鱼的话题在网络上很火,有人就靠打窝子、包塘的短视频创业。我本就喜欢钓鱼,趁机更新了装备,打算拍在运河上钓鱼的短视频,就算没有流量,也能调剂生活。”(SDP)

自适应调节是数字媒介使用与青年船民职业选择递归优化的主要方式,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青年船民的职场焦虑,又是数字媒介的优化方向,但其调节能力是有限的,在面对船民后代教育、家庭财产保值,数字媒介垄断等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因此,需要遵循媒介本体特征,正视其阶段性局限,结合船民群体职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当下问题,给予自适应调节充足时间和试错空间;同时提供间接性引导,以预防崩坏性事件的发生,提升自适应调节的效率。

(三) 间接性引导:兜住底线与消除后顾之忧

尽管运河航运业总体发展趋势向好,青年船民职业选择与数字媒介使用间的自适应调节能力逐步提升,但长期远离家庭、职场前景模糊等现实问题仍旧困扰着青年船民,因运量过剩导致的市场竞争加剧、货船价格贬值等结构性矛盾也有待缓解。与此同时,数字媒介在迅速迭代与普及应用的过程中也带来情感异化、媒介信任等问题,加之船民认知和实践能力的局限,导致其在社会深度媒介化进程中时常处于随波逐流的被动状态。因此,在自适应调节的基础上,政府职能部门需要在兼顾数字媒介逻辑与航运业运行规律的前提下,采取间接性引导措施,以保障船民群体的合法利益。

其一,兜住底线,盯紧近忧,预防崩坏性事件的发生。对于青年船民而言,跑船能否维持一家生计和二手船只价格既是近忧,又是底线。“像我们这样的个体户,一艘船就是全家收入来源,至少要解决温饱。”(HZY)“跑船挣的钱都用于县城买房了,现在房价跌得厉害,家里真正值钱的还是这艘船,所以格外关注二手船的行情。”(ZCY)针对当前航运业饱和现状,政府部门既通过精简管理流程、开凿新河道缩短航运里程等方式降低船民成本,又出台了一系列补贴政策推动二手船只的更新换代^①。但此类政策在制定、出台和执行过程中时常被自媒体平台捕风捉影,甚至为了吸引流量断章取义,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而政府部门的权威发布时常慢半拍,官方回复往往晚一步,导致政策效能未能及时发挥。

其二,消除后顾之忧,提升沿线服务水平,聚焦留守家庭主要需求。相较于因数字媒介普及所导致的信息垄断、技术鸿沟等新问题,船民的后顾之忧已延续千年,在温饱不愁的当下变得愈发突出。一方面,当前运河沿线船只停靠区的服务水平有待提升,部分设施利用率低,难以满足青年船民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针对后代教育的问题,青年船民希望获得更多权威回复。笔者在SDP夫妇家中调研时发现,老师在定期家访时会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向青年船民交代注意事项,以明确学校、老师和监护人的责权。青年船民非常重视老师的定期连线,是其了解后代成长情况的少有的权威回复,但目前此类连线时间短暂、频率较低、内容单一,存在形式主义等问题。

来自政府职能部门的间接性引导聚焦船民的远虑近忧,与其自适应调节相辅相成,既依赖数字媒介基础设施发挥作用,又承担着船民利益保障者和航运业生态设计者的角色。相较于数字媒介时代船民媒介素养提升的任重道远,运河航运业自适应调节的长期性,政府职能部门应当率先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推动数字媒介使用与青年船民职业选择递归优化的突破口,具有先导示范的潜能,从而引导船民结构化认知数字媒介使用与职业选择的复杂关系,支撑并推动运河航运业自适应调节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胡翼青. 西方媒介学名著导读.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 [2] 屈济荣,李巽平. 互联与互文:数字媒介的互文性初探. 编辑之友,2020(6):55-63.
- [3] 张苏秋,王夏歌. 媒介使用与社会资本积累:基于媒介效果视角. 国际新闻界,2021(10):139-158.
- [4] 常江. 媒介基础设施化、新闻弥散与倦怠社会的纾解. 南京社会科学,2025(1):104-113.
- [5] 赵立兵. 触屏之“感”:数字媒介使用的界面交互与身体觉知. 新闻记者,2025(5):83-96.
- [6] 缙赫. 农村学前儿童数字媒介使用与社会情感发展的关系研究. 全球传媒学刊,2025(2):148-170.
- [7] 朱战辉. 返乡青年的媒介实践与县域城市融入机制分析. 中国青年研究,2024(2):69-77.
- [8] 梁爽,陈雪娇. “在云端”:智能媒介技术推动下的青年职业衍生与青年文化延展. 中国青年研究,2022(11):22-29.
- [9] 黄纯艳. 宋代内河船夫群体的构成与生计——以漕运为主的考察.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7(5):22-35.
- [10] 伊尼斯. 帝国与传播.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11] 苏剑,杨盈竹. 房地产行业最优规模探讨. 社会科学研究,2024(1):85-95.
- [12] 林爱珺,何艳明. 数字媒介依赖的新表征与伦理反思. 学术研究,2022(5):54-60.
- [13] 阿伦特. 启迪:本雅明文选. 张旭东,王斑,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14] 延森. 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 刘君,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 [15] 胡翼青,姚文苑. 重新理解媒介:论界面、内容、物质的三位一体. 新闻与写作,2022(8):5-16.
- [16] 刘俊勇,安娜,段文譔,等. 结构化理论视角下的成本管理变革:来自公立医院的经验启示.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2(3):59-68.

^①交通运输部等十三部门于2024年6月印发的《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新行动方案》支持老旧船舶加快报废更新;杭州市公路与港航管理服务中心于2024年5月出台了年度补贴政策,以一艘2003年建造的300总吨货船为例,可享受将近19万的补助。

- [17] 林爱璐,何艳明.数字媒介依赖的新表征与伦理反思.学术研究,2022(5):54-60.
- [18] 姜小凌,匡颖.数字疗愈与场景适配:基于豆瓣社交能力复健小组的个案考察.新闻与传播评论,2025(6):88-99.
- [19] 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刘君,李鑫,漆俊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Digital Media Use and Career Choice of Young Boat People: From Making a Living by Boats to Taking Boating as an Occupation

Leng Nanxi(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oral and experiential transmission of workplace knowledge has gradually been replaced by standardized and digitalized processes. Digital media us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variable influence for young people's career choic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requires further clarification. Self-employed individuals engaged in canal shipping(referred to as "boat people") constitute the largest group in the current canal workplace. Their career choices have been transformed by digital media use while retaining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heavy-asset operation and living on board as a permanent residence. Based on a survey of 44 boat people, this study adopts a comparativ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a media theory analytical framework. It aims to elucidate the impact of digital media use on their career choices and boat people's acceptance of digital media, and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recursive optimization between the two.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from a diachronic dimension, unlike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boat people who made a firm career choice of making a living by boats and whose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were unilaterally dominated by limited media forms, young boat people's career choices exhibit compulsion, temporariness, and variability in taking boating as an occupation, and are predominantly influenced by digital media use. From a synchronic dimensi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media use on young boat people's career choices is dual-faceted. In response to their workplace condi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immediate concerns and long-term anxietie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recursive optimization system with structured cognition as the prerequisite, adaptive adjustment as the core, and indirect guidance as the supplement.

Key words: digital media use; career choice; young boat people; canal

■收稿日期:2025-03-25

■作者单位:冷南羲,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责任编辑:刘金波